乾嘉考据学的传统与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

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　乾嘉考据学秉承“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讲求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在传统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且深刻影响了近代学术,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考据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与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乾嘉考据学的求实方法、求真精神和批判意识,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以史料考证为基础,详尽占有史料、严谨考辨史料,同时根据时代变化,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史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关 键 词　乾嘉考据学; 新历史考证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学“三大体系”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23.02.007

中国是一个拥有 5000 多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传统史学的积淀极其丰富,是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源。有论者指出,“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发掘和梳理其中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并加以继承和发扬,……是显示历史学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重要路径”①。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过程中,清代乾嘉时期成熟并完善的考据学就是这样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乾嘉考据学拥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思想与方法,不仅在传统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深刻影响了近代学术,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其有益思想和合理内核经过继承和发展,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的史学研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永恒价值。探寻乾嘉考据学传统的基本内容,分析其在近代史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变迁,对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宝贵经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实事求是”: 自成思想与方法体系的乾嘉考据学

“考据”本指对古籍的文字音义及古代的名物制度等进行考核辩证,以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典籍为代表,作为一种为学方法被后世继承。清乾嘉时期,考据学臻于极盛,在传统学术史上独树一帜。乾嘉学者对于“考据”“考证”有着极为自觉的认识,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思想与方法。

作者简介: 王记录,男,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22JJD770012) 。

①瞿林东:《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2 期。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乾嘉学者在进行文献和历史考辨时，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宗旨。“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景十三王传》，其言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云：“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①指河间献王在文献搜求和图书版本校勘上采用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乾嘉学者将“实事求是”作为治学的根本宗旨，主张“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②，并将其作为衡量学术价值、评价学人水平的重要标准。

在这一治学宗旨作用下，乾嘉学者治学反对“凿空”“株守”。一些宋代学者空衍义理，最受乾嘉学者诟病。凌廷堪说：“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③值得注意的是，乾嘉时期，部分学者株守汉学，泥古不化，同样遭到批评。阮元指出：“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④钱大昕也说：“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焉者可也。”⑤株守门户必然导致学术上的固步自封，“从其是”才是学问正道。由此可见，作为治学宗旨的“实事求是”包含不墨守、不立异、不空谈、不株守门户等内容，一切以“求是”为核心，以获得学术真谛。

乾嘉学者坚持“博求实证”的治学原则，要求研究学问要有多种手段和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乾嘉时期的一流学者大多都学识广博。时人曾盛赞钱大昕“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⑥。淹贯博通的目的是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究治经史，触类旁通，严核是非。乾嘉学者普遍认为，究治经史，必须掌握文字、音韵、天文、典制、舆地、算术、律吕、金石、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因为考据的内容无所不涉，综合使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泛览博涉、反复比较，才能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

“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乾嘉学者治学，在方法上强调渊综、贯通和实证。他们特别注重从文字音韵入手治经史，用通例归纳的方法治文献，用无征不信的方法求真相，重视博涉专精与综观会通的结合，重视实地调查观察，甚至使用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治学⑦。他们讲求博征，注重归纳，长于考证，有着一套严格的治学路数，特色鲜明、自成一体。在史学领域，“实事求是”则既包含坚持直书、反对曲笔等思想主张，也包含比较、归纳、溯源等考证方法。“就是要以记载和考证历代典制与事迹之真实为己任，然后写出尊重真实事实的信史”⑧。

二、考据学的重构：新旧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新历史考证学

大凡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都会在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转化，成为后人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20 世纪上半叶，在“新史学”的感召下，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新历史考证学”，并成为当时“中国史学的主流”⑨。

---

①班固：《汉书》卷 53，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410 页。

②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9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3 页。

③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17 页。

④阮元：《研经室集》（上），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250 页。

⑤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9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6 页。

⑥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1 页。

⑦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崇文书局 2001 年版。

⑧罗炳良：《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0 页。

⑨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清代历史考证学是 20 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直接源头”①。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虽在治学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都十分重视乾嘉考据学的思想与方法，在征实考信方面下功夫。

梁启超赞赏乾嘉学者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指出他们“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他”②。王国维精通乾嘉学者严密的考证方法，对传统考据学有独到领悟，他具有标杆性的“二重证据法”，便是在深刻理解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后，结合近代考古学而提出来的，当代学者也认为“王国维研究古文字和古史，在学术源流上，与乾嘉学者有密切关系”③。陈垣被称为乾嘉史学殿军，曾自言“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氏”④。陈寅恪虽然认为有清一代史学不如两宋，但服膺清儒钱大昕的学问，认为其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⑤。钱大昕治史重视对舆地、官制、氏族的解析，陈寅恪著史，也常以职官之演变与氏族之升降为论述重心。这些学者得益于传统考证学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又与西方史学观念相结合，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新历史考证学者将乾嘉考据学的思想与方法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融会贯通，利用新发现的史料，不仅赋予考据学以新的时代内涵，而且开启了新的史学研究门径。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一是把“复古”变成“求新知”，二是将“考实”与“贯通”相结合。就前者而言，乾嘉考据学者治学推尊汉儒，思想被经学所笼罩，虽然也接触了部分西洋天文、地理、历算等方面的知识，但主导取向是“复古”而不是“开新”，“即力求回到古代最合理的治学方法中去，而不是面向西方融汇新知”⑥。新历史考证学则不同，一大批学者在掌握考据学方法的基础上，主动接受西方的科学观念和史学思想，展示出“融汇新知”的特点。就后者而言，学者陈其泰以“实证考察”和“贯通认识”概括之。所谓实证考察，就是“严密考证和重视扩充史料”；所谓贯通认识，就是历史见识和重视理论指导。虽然乾嘉学者也重视“考实”与“贯通”，但新历史考证学者在史料审查的观念与逻辑、占有资料的范围、科学观念的运用、历史因果的探求等方面，都超越了传统考据学者，达到了更高层次。如王国维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扩大了史料范围，并在琐细的资料之间，纵横贯穿，“将甲骨文字的研究引到古史上去，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⑦。陈垣继承乾嘉考据学的传统而又运用近代科学的方法，实现了校勘学、年代学、目录学、避讳学的“条理化、系统化”⑧，推动了古典校雠学向近代文献学的转换。陈寅恪长期致力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在乾嘉学者实事求是、严密考证方法的基础上，吸纳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民族—文化”观念，钩稽史料，抉幽阐微，通过比较研究，归纳因果关系，力求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事物的联系。

总之，20 世纪上半叶，新历史考证学家吸纳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与西方史学观念相结合，或修正其流弊而用之于历史研究，或领会其精神而提出考据方法的新见解，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传统考据学，具有一定的意义。

---

①张越：《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原因初探》，《人文杂志》2003 年第 6 期。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0 页。
③洪认清：《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后卷》，黄山书社 2002 年版，第 6 页。
④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24 页。
⑤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6 页。
⑥杨念群：《乾嘉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史学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⑦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84 页。
⑧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3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考据与理论的结合：唯物史观视野下考据学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史学，旧学修养深厚、以史料考证为根基、受新历史考证学濡染的一大批学者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洗礼，将考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也极为重视资料的考辨。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唯物史观教育，一大批受过严密考证方法训练的中青年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集体转向唯物史观。他们将唯物史观融入对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岑仲勉以考证精良闻名学界，新中国成立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运用唯物历史观来解决中国古代史的问题”①，治史境界发生巨大变化，所著《隋唐史》《黄河变迁史》，考证缜密，视野开阔，内容丰富，成为20世纪史学名著。蒙文通在新中国成立后自觉接受唯物史观，其享誉学林的《越史丛考》，既体现出其精于史料考证、学术根底深厚的治学特色，又体现出运用唯物史观洞察历史问题本质的卓识。唐长孺在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时，除了进行复杂的史料校勘和史实考证工作外，还力图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需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②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考证学者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也多有肯定，对史料考证的工作进行积极评价。范文澜早年治学崇尚乾嘉考据，“追踪乾嘉老辈”，“沉溺在训诂考据的圈子里”③，从事经学研究。他曾一度“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④，以传统经史研究自期。郭沫若认为王国维、罗振玉的古史考辨是相关研究无法绕开的，“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⑤。侯外庐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时吸收了乾嘉考据学考辨资料的方法，他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基础，作者的时代，著书的真伪，文字的考证，材料的头绪，皆专门学问，清代学者于此成就虽宏，而慎以取舍，颇为难题，若稍不慎，即张冠李戴。”⑥他“赞赏王国维考辨史料的谨严方法”，原因就在于王氏对待历史材料“谨守科学的法则，善于汲取前人的考据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勇于创新”⑦。翦伯赞则明确指出，在史料考证方面，必须继承乾嘉学者和新历史考证学者的遗产而有所超越，“一面批判地接受清代学者对文献上的史料之考证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开辟一种新的考据学，进行对考古学上的资料之考证。用现在既存的考古学的资料，去衡量清代学者考证过的史料，使考古学的资料与文献上的资料结合为一，然后史料的考证，才算达到最后的完成”⑧。吕振羽也指出，“对于过去考据学的优秀成果，还是应该批判地继承”，他希望在借鉴乾嘉考据学及近代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考据学的体系”⑨。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考证学者深厚的考辨功力、求实的治学态度、缜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等给

---

①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②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3页。
③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第3卷第2期，1940年。
④《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⑥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文风书局1946年版，第2页。
⑦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5页。
⑧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⑨李勇：《吕振羽史料学理论与实践》，《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1期。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予了高度评价，并把继承其学术成果、借鉴其考据方法、发扬其治学精神，看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条件，这说明秉持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同样十分重视对历史资料的考辨，力求言必有据，立论坚实，对于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更是给予坚决反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从资料出发，广泛占有资料，认真考辨资料，是阐发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

四、历史学“三大体系”构建中考据学的地位

乾嘉考据学作为传统史学的重要资源，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可谓历经沧桑。从清代的乾嘉考据学，到 20 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再到秉持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其间社会性质、思想文化、史学范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文化氛围和历史研究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以文献考证为重心的考据学始终贯穿在不同的史学形态和研究范式之中。为什么考据学的治史方法具有价值呢？其特殊的内在因由值得探讨。

其一，优秀史学传统的持久生命力。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理论和话语。就历史思想而言，有古与今、变与常、时与势、封建与郡县、一统与分裂等对客观历史进程之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论述，形成了中国人解释历史发展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史学思想而言，更有着层次分明的关于史学问题的认识与论述，诸如表述史学社会功能的鉴戒、资治、经世，彰显治史态度的直书、实录、信史，体现历史编纂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书法，表达史家修养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等，同样形成了中国人有关史学工作的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这些体系化的理论和话语，经过新的整合与阐释之后，大多都融会到现当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中，在当代史学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考据学作为其中具生命力的一部分，同样能穿越时空，与近现代以来的史学观念相结合，在历史研究最基础的领域——历史资料的整理、辨析、批判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二，史料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必经门径，是整个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历史事件一去不复返了，研究历史只能依靠历史资料，舍此，历史研究可能无法进行。而要通过真伪间杂的资料获得真实的历史，考辨工作必不可少。对此，不同流派的史学家都有清醒的认识，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说“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①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陈垣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②郭沫若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③翦伯赞反复强调“从具体的史实出发”研究历史，而具体的史实就隐含在史料之中，“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专放空炮是打不中敌人的”④。占有资料和考证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入门功夫和能力，“可以说没有或不懂考据学，不可能成为好的史学家”⑤。几千年史学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以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其三，史学求真精神、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的需要。史学求真有多个层面的含义，辨析资料、去伪存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实事求是”是乾嘉考据学者治学的基本立足点，他们有着反对虚妄、注重证据的治史态度，形成了广搜史料和慎重考订的学风，广搜博采，无征不信，凡立一义，必有证据。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74 页。

②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98 页。

③《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 页。

④《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8 页。

⑤侯云灏：《20 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4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可以这样讲，乾嘉考据学“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①。近现代史家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考据学派的这些合理因素，结合时代发展和新的史学观念，创造出了辉煌的史学业绩。时至今日，在反对历史研究学风浮躁、流于空疏的弊病上，历史考证学依然被有见识的史家提倡，兴而不衰，说明求真、求实永远是史学研究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由此，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文献考证这一具有生命力的内容。

就史学学科体系而言，中国古人没有现代学科观念，如今的史学学科，是20世纪新史学产生以来才逐步建立起来的。100多年来，历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大致经历了四种模式。一是强调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这一模式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纳入史学领域，作为研习史学的先决条件。二是强调以整理史料为核心，加强对史学典籍的研习，掌握历史研究的工具和方法。三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八大块”体系，即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分级构建模式，其间经过了多次调整，2011年开始在历史学大类下设立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以今日眼光观之，无论哪一种学科构建模式，都离不开最基本的史料建设这一基础性工作。中国史当中的历史文献学，世界史当中的西方文献学，考古学当中的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都说明了史料建设和辨析的重要。历史学学科构建，传统考据学的遗产是必须继承的，这是能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内容。去掉最基础的史料考证，历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将难以进行。

学术体系是系统的、专门的学问体系，包括“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以及“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②。在历史学学术体系构建中，乾嘉学者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尤其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实事求是”的史学本义是考据学意义上的治学方法和态度，但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上升到哲学认识论高度，使其具有了特定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③无论是作为学术概念的“实事求是”还是作为学术实践的“实事求是”，都彰显着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从实际出发”来看待问题。马克思主义主张从社会实际出发考察社会现象，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从史料出发研究历史。在历史学学术体系构建中，“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④。因此，在历史学学术体系构建中，要处理好理论和史料的关系，坚持从历史资料出发来探讨历史。对那些不全面、不完整、不准确的资料进行考辨，做到论据真实充分，然后在此基础上获得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启迪后人，促进学术和社会进步。可以说，“实事求是”是史学学术体系建构的内在法则，理论的提升和史料的考辨是史学发展的两翼，理论的不断进步为史学的腾飞插上翅膀，文献的考辨为史学发展打下基础。考据是历史研究的手段，不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但是，舍弃了这样的手段，终极目的就难以达到，没有以文献整理为基础的史学学术体系将如同“海市蜃楼”一般。

话语体系是学理的系统表达。史学话语体系就是围绕着思想、理论、观念等所形成的概念、范畴、语言风格等史学的表述形式。话语体系的变迁标志着思想观念的变化，从中国史学发展史来看，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话语体系，乾嘉考据学中的诸多概念都是

①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5页。

②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新史学诞生，形成了新史学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逐步形成了以唯物史观等相关概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主流话语。以今日眼光观之，20 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一直处在不断创新和重构的过程中。新史学扬弃了传统史学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取代了新史学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坚持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的框架内，根据中国历史实际构建新的体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史学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田昌五著《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曹大为等主编《中国大通史》、刘泽华等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等，都在尝试用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叙述中国历史。在史学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的过程中，作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史料考辨一直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话语体系的构建要建立在充分可信的历史资料基础之上，没有充分可信的历史资料，话语体系构建也难以进行。

总之，以史料考证为重心的考据学在历史学“三大体系”构建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实事求是”应该成为构建“三大体系”的准则，因为它集中体现的是一种求实的方法、求真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唯有“求实”，才能做到理论与史料并重和互释，防止出现史料堆砌；唯有“求真”，才能重视对资料的考辨，尊重历史的真相，撰写出令人信服的自成体系的史著；唯有“批判”，才能不断反思既有史学体系存在的问题，建立新的史学体系。

与此同时，史学体系的构建不能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它应该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学科间的开放，第二是国家间的开放。乾嘉考据学在 20 世纪上半叶被改造成新历史考证学，就是破除了传统史学的封闭性，打破了学科和中西间的壁垒，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都被应用于历史的实证研究，西方的史学观念与本土的史料考证相结合。当下的史学体系建设，同样也不能封闭，应“从多学科的对话、融通中，发现理论、方法创新的灵感”，“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史学开展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从中汲取有益的智慧和营养”①，同时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融入新内容，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前提下，与世界史学对话，开展各国史学体系的比较研究，汲取其精华，探索其异同，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史学体系。

五、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历史研究。习近平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要“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②，这对新时代历史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方向。乾嘉考据学作为传统史学的重要遗产，可以为新时代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提供经验。

（责任编校：马延炜）

①《第八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武汉召开 努力推动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10 月 13 日。

②《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强调 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民日报》2019 年 1 月 4 日。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